

日前,亚洲首个以意大利建筑大师帕拉第奥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几何·和谐·生活——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从古典到经典的建筑艺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揭幕。展览汇聚来自意大利维琴察、威尼斯、帕尔马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110件(套)珍贵展品,系统呈现这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的理念与作品。

450余年前,帕拉第奥在威尼斯出版《建筑四书》,记录了古罗马的建筑智慧。如今,这些承载着帕拉第奥思想的实物跨越重洋,与中国建筑遗产开展面对面对话。这场展览不仅呈现了帕拉第奥的创作历程,更揭示了建筑如何成为人与自然、历史与当下、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桥梁。

筑基立本:扎根实践、兼顾实用与审美

帕拉第奥原名安德烈亚·迪·彼得罗·德拉·贡多拉,1508年出生于意大利帕多瓦,后移居维琴察。13岁时,他被送入石匠作坊学习雕刻,日复一日与石块和刻刀相伴,练就了对材料、结构与细节的极致敏感,也奠定了他建筑创作扎根实践、兼顾实用与审美的特点。

帕拉第奥成长的年代里,威尼斯共和国正经历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变革。16世纪的威尼斯是由贵族阶层统治的寡头政体,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数十个显赫家族手中。帕拉第奥的赞助者包括维琴察和威尼斯的贵族家族,他们既是土地的拥有者,也是丝绸贸易和农业生产的投资者,帕拉第奥因此得以将建筑实践与农业经济紧密结合,创造出兼具生产功能与审美价值的别墅类型。

帕拉第奥命运的转折发生在遇见人生最重要的导师——维琴察贵族、人文主义者詹·乔治·特里西诺之后。在导师帮助下,帕拉第奥阅读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阿尔伯蒂等写就的古今建筑文献,并于16世纪40年代三次随导师赴罗马考察古代遗迹。在测量、描绘中,帕拉第奥推导出古罗马建筑形式背后蕴含的几何规律,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建筑如何塑造城市面貌与政治象征。

展览第一单元“奠基——古典的测量师”中,朱斯托·丹特1640年绘制的《里斯埃拉村瓦尔蒙德拉纳和提耶内家族地产图》呈现了帕拉第奥对乡村空间的规划——一条笔直的道路连接两座别墅,至今仍可供村民日常通行。这体现了帕拉第奥的理念:建筑并非孤立的艺术品,而是绵延不绝的生活背景。

埃莫别墅模型堪称帕拉第奥乡村建筑理念的典范。这座建于16世纪50年代的别墅坐落于意大利威尼斯的法恩佐洛,主宅、敞廊与鸽舍沿轴线顺序排列。主宅建于高基座之上,长坡道便于马车运送谷物至阁楼,体现实用功能;两侧低矮绵长的拱形农舍渐次融入田野,展现建筑与自然对话的诗意表达。

《建筑四书》:“新惯例”建筑理念影响后世数百年

1570年,帕拉第奥在威尼斯出版了《建筑四书》。这部著作图文并茂,语言平实,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知识的广泛传播。其中《第一书》阐述建筑的材料、构造与柱式规则,《第二书》收录帕拉第奥设计的别墅与府邸,《第三书》系统介绍城市公共建筑与桥梁设计,《第四书》则主要是



理念之书与文化之桥

李路珂



古罗马神庙建筑的复原研究。展览中展出的1570年威尼斯初版《建筑四书》,正是他的建筑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之作。

书中最精华的观点之一,是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新惯例”建筑理念,其核心是一套系统化的设计方法。帕拉第奥将建筑视为一种语言,由有限但精心选择的“词语”构成,其“语法”是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他构建了一套基于模数的标准化体系:3种基本房间(24英尺×16英尺的大矩形、16英尺×16英尺的方形、16英尺×12英尺的小矩形),8种楼梯类型,以及门窗的具体形制。这些“原子”般的元素可以组合成无限多样的“分子”布局,形成一种可复制的创作过程,能在多样化的场景和条件下建构出美观、经济且耐久的建筑。

展览中的“别墅积木”以3D块状模型生动呈现了这一设计逻辑——3种基本房间如同积木般自由组合,生成从埃莫别墅的线性排列到弗斯卡里别墅的L形布局等丰富变体。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帕拉第奥如何将复杂的建筑设计转化为一套可操作、可学习的规则体系。

科尔内利奥·杜斯曼的油画《维琴察巴西利卡集市》描绘了帕拉第奥设计的巴西利卡连拱廊下,市民在市场中购物的场景,孩童在柱间嬉戏的场景。这座建筑的底层设有商铺,上层为市议会使用——帕拉第奥的设计从一开始就考虑到公共生活的需要,而非仅仅是形式的美观。

《建筑四书》让帕拉第奥的影响力超越时空。17世纪初,英国建筑师伊尼戈·琼斯将帕拉第奥的设计语言与英国本土传统相结合,创造出“英式帕拉第奥主义”,其代表作白厅国宴厅至今仍矗立在英国伦敦。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特区,托马斯·杰斐逊在1792年匿名提交的总统官邸方案中,大胆改良帕拉第奥圆厅别墅,见证了帕拉第奥如何成为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构建公共建筑语言的灵感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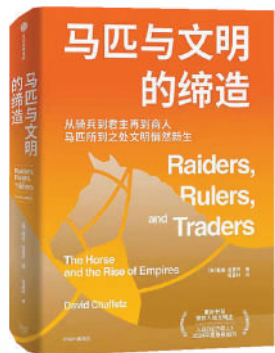


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1570年威尼斯出版的《建筑四书》封面、《营造法式》清代抄本、《里斯埃拉村瓦尔蒙德拉纳和提耶内家族地产图》展览展出的特里西诺别墅模型。以上图片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马蹄声中的文明密码

谢灏



早期驯养的牲畜中,马和牛的角色与今天相比是互换的:马提供奶制品,牛用来骑乘和拉车。人类为挤奶而驯养马匹,是人与马亲密关系的肇始。在随后的岁月中,人类逐渐发现马匹能护卫羊群,适应各种恶劣环境,更适宜成为畜群引领者,此后逐渐发展为驮马、战马,马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助手,乃至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于古代文明而言,马匹的重要性不亚于如今的石油和人工智能。欧亚草原之间崛起的中国、印度、波斯等源远流长的璀璨文明,正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

化激烈交锋的最前线。查费茨指出,骑兵的出现令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呈现新的局面,即使是较小的草原民族也能对强大的定居国家构成威胁。压力之下,定居国家开始采购战马、训练骑兵,并在对抗中逐步发展。

书中以汉唐时期的中国为例: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赫赫战功,得益于汉武帝继承自秦始皇的严密骑兵管理措施,此后逐渐发展为驮马、战马,马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助手,乃至重要的战略资源。

除了描绘金戈铁马的图景,查费茨也讲述马匹承载的文化意蕴。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见证了佛教经典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真实的“白龙马”反向而行,驮着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天竺,留下珍贵的《大唐西域记》,也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蓄积原始素材。马的力量、耐性、稳健也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突厥吟游诗人笔下,“骏马耳竖凝

文明互鉴:中西建筑传统的对话与共鸣

本次展览最令人振奋的部分,是它首次将帕拉第奥的建筑世界与中国古代建筑传统并置呈现。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1601年威尼斯版《建筑四书》,扉页上有“耶稣会中国传教士协会”题签,印证了早在17世纪上半叶,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就将西方建筑知识带入中国。2015年,《建筑四书》拥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由我和清华大学的郑文博合作翻译。至此,《建筑四书》在全球已拥有超过50个译本。

并置展出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抄本《营造法式》、明刻朱墨套印本《考工记》以及圆明园烫样,揭示了中西两种建筑传统各自独立发展出的精妙体系。



《考工记》作为中国首部系统记述手工业技术的官修典籍,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准则,并确立了都城规划的范式。这与帕拉第奥在《建筑四书》中对选址、材料及比例的严谨论述形成跨文化的呼应。

中意传统建筑理念在视觉、自然秩序与功能效用、经济性等方面也时常出现大相径庭之境。如帕拉第奥的“凸曲线”与《营造法式》的“卷杀”虽然都涉及曲线轮廓,前者是为立柱轮廓设计的弹性曲线,利用细木条弯曲而取得,后者则用于各类木构件的端部,通过分段直线切割,形成近似圆滑,便于与其他构件结合的轮廓。这种差异并无高下之分,而是两种文化面对相似需求发展出的不同“词语”与“文法”。

本次展览的标题“几何·和谐·生活”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帕拉第奥建筑思想的精髓:几何是方法,和谐是目标,而生活——无论是威尼斯贵族的乡村别墅生活,还是维琴察市民的市集日常——才是建筑最终服务的主体。

4个多世纪前,帕拉第奥在《建筑四书》·《致读者的前言》中这样阐述本书的价值:“这对那些不是仅仅为自己而生,而是还想要对别人有用的人,是有价值的。”这或许是他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建筑不是石头的堆砌,而是人类生活的背景、文明的载体,以及跨越时空与文化的对话媒介。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建筑四书》中文译者)

在非洲遇见“乌班图”

戴楷然



春节前,我在南非乡间参加了一场篝火晚会。夜幕降临,空地中央燃起熊熊火焰,火光映照人群笑脸。身穿传统服饰的青年们随鼓点起舞,节奏热烈而欢快,歌声与笑声在夜色中回荡。我坐在一旁,品尝着当地特色烧烤。这时,一个男孩走到我身边,热情邀请我加入舞圈。得知正值中国春节,他笑着说:“你更该和我们一起庆祝。”说完,他伸出手,把我拉进跳舞的人群。

后来,我和一位当地文化学者聊起非洲朋友的热情,他告诉我,这种自然亲近的背后,是一种深植于非洲日常生活的观念:“我在因我们在,我们在故我在”——这正是非洲乌班图思想的核心。这种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体的存在建立在集体或社会之上,个人与集体是一种共存关系。在当下许多社区,人们相信一个人的正直离不开他人支撑,人与人的联结才是生活展开的基础。

乌班图思想起源于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当时,非洲社会结构以氏族或部落为基本单位,个体高度依赖群体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调互助、分享与集体责任的价值观念逐渐沉淀为社会规范。

在传统祖鲁人与科萨人社区,有这样一种议事方式:整个村庄的人围坐在树荫下,由一位年长者开始,人们依次发言,讲经历、提担忧、补充细节。没有人急于表达或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讨论如水流般回旋,直到不同声音逐渐靠近。人们在反复表达与倾听中确认彼此存在,也在共同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强化群体认同。

进入殖民时期,这种以共同体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遭遇了冲击。殖民政权打破原有的部落结构与资源共享机制,将人群重新编入以种族、身份和劳工属性划分的等级体系。然而,乌班图思想并未消失,它以更为隐性的方式保存在非洲家庭和乡村的日常伦理中。20世纪中后期,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乌班图思想被重新激活,并被赋予反抗压迫、追求平等的新内涵。

在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进程中,



下图:南非比勒陀利亚城市一隅。孙翔摄(影像中国)

画作赏析:《倒牛奶的女仆》

王恒



《倒牛奶的女仆》(见上图,资料图片)被誉为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荷兰画家维米尔将一名女仆倒牛奶的瞬间定格——她的动作克制而专注,空间静谧且安定,呈现出近乎恒久的日常之美,也折射出17世纪荷兰民

众富足、社会平和的生活气息。画面中大量使用珍贵的群青,这种来自阿富汗的颜料在当时价格甚至高于黄金,通常只用于描绘宗教人物或权贵形象,维米尔却将它赋予一位普通女仆,让平凡者获得庄重与尊严。这一选择,既得益于赞助人的支持,也与他妻子较为殷实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目光移至桌案,那件蓝色瓷器同样暗藏一段历史。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促成“代尔夫特蓝陶”在荷兰流行。这种瓷器的光泽感与装饰性,契合了维米尔对质感与细节的追求,因而在画面中被细致地呈现出来。从昂贵的群青到流通的青花瓷,这抹蓝色将维米尔的艺术世界与17世纪荷兰的繁荣图景紧密相连。(作者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rmbgjgf@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